



## 《資治通鑑》的「愛情故事」

● 施寬文\*

治平四年（1067）十月九日，宋神宗趙頊在司馬光進讀《資治通鑑》後，面賜御序，以其書「論次歷代君臣事迹」，因援《詩經·大雅·蕩》「殷鑑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」之說，賜書名為「資治通鑑」（趙頊〈資治通鑑序〉）。《通鑑》內容，雖如司馬光〈進書表〉所說，以人事之有關「國家盛衰，生民休戚，善可為法，惡可為戒」者為主，卻也如胡三省所云：「不特記治亂之迹而已，至於禮樂、曆數、天文、地理，尤致其詳。讀《通鑑》者如飲河之鼠，各充其量而已。」（卷 212）因此，在書中有關政治、軍事、經濟，等等國家大事的載述之外，常可發掘出夾雜在盛衰休戚、善惡法戒等歷史敘事之中的另類小故事，與「愛情」有關者即為其中之一。

一般而言，愛情與兩性有關，《通鑑》中最常見的兩性關係，不外於帝王與后妃，只是囿於「資鑑」的編撰目的，書中所載述的帝王與后妃互動之事，若非多載后妃之以德感君，即多述君主因后妃之美色而荒敗，固著眼於「勸」與「懲」。前者如卷 194 唐太宗得疾，長孫皇后不僅晝夜親自侍奉，且攜毒藥云：「若有不諱，義不獨生！」而《通鑑》載長孫皇后去世後，太宗之「不能忘懷」，則是因為「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，失一良佐！」又如卷 44 明德馬皇后無子，漢明帝以皇子劉炆託養，安慰云「人未必當自生子，但患愛養不至耳！」溫情蘊乎言中，而《通鑑》對於明帝對后「始終無衰」的感情，其解釋與強調的卻是明德皇后之「德冠後宮」。至於後者，如卷 171、172 北齊後主高緯之與馮小憐，年輕的高緯待馮氏「坐則同席，出則並馬，誓同生死」，宜有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

愛情，但《通鑑》著墨的是後主因馮氏而荒政，最後且因馮氏而致兵敗亡國的經過。至於唐玄宗與楊貴妃，其事見諸《通鑑》卷 215、卷 216、卷 218，白居易〈長恨歌〉謳歌二者之愛情，《通鑑》則載述玄宗之溺寵失政、貴妃與祿山之「醜聲」，固重在於女色敗國之殷鑑。

《通鑑》所載述的帝王與后妃諸事，雖然重在鑑戒，但細加察閱，仍可發現其間隱微的愛情迹象，然而，畢竟是少數，更常見的是帝王視后妃為「寵物」，后妃雖然得寵，不見得彼此之間有真正的愛情。如《通鑑》卷 178，隋文帝開皇十九年（599），生性妬忌的獨孤后因為尉遲迴女孫以美色得寵，遂私下殺之，文帝得知後大怒，「單騎從苑中出，不由徑路，入山谷間二十餘里。高穎、楊素等追及上，扣馬苦諫。上太息曰：『吾貴為天子，不得自由！』高穎曰：『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！』上意少解，駐馬良久，中夜方還宮。后俟上於閤內，及至，后流涕拜謝，穎、素等和解之，因置酒極歡。」文帝對於尉遲迴女孫之死，傷痛的不是至愛的失去，而是有感於受制於一悍婦而「不得自由」，及親近勸和，則真能「不以一婦人而輕天下」，遂與制己之悍婦「置酒極歡」。尉遲迴女孫雖得寵，究其實際，其在文帝眼中不過一「寵物」耳！

《通鑑》載述宮廷人事重在鑑戒，故而不易在其中覓索與愛情有關者，至於宮廷之外的敘事，細加品閱，則頗有之。如卷 105，晉孝武帝太元九年（384），

鮮卑慕容農因為前秦淝水之戰大敗，趁機謀助父親慕容垂復國而奔往列人起兵，暫憩於舊奴魯利家中，魯利為他準備餐飲，卻因為慕容農笑而不食而疑惑，因問其妻：「惡奴，郎貴人，家貧無以饌之，柰何？」其妻云：「郎有雄才大志，今無故而至，必將有異，非為飲食來也。君亟出，遠望以備非常。」胡三省注魯利呼妻「惡奴」云：「蓋詈其妻之語」，就語境觀之，胡說非是。清人趙翼《陔餘叢考》「惡奴」條引明人陳濟《綱目集覽正誤》之說，云：「此乃戲罵其妻之辭，非名也。」<sup>1</sup>則此宜為男女之間的親暱語，猶如關係親密的男女以「死鬼」、「八婆」謔稱彼此，魯利與其聰慧妻子之間的感情，盡見諸「惡奴」之稱呼。

此外，《通鑑》卷 169 載述北齊武成帝高湛因為猜忌其侄高百年，遂因讒言而召之

<sup>1</sup> [清] 趙翼：《陔餘叢考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0），卷 15，頁 261。



，欲藉故殺害。高百年赴召之前，自知不免於死，因割腰帶之玉玦留予其妻斛律氏，用為紀念。高百年慘死後，斛律氏「把玦哀號不食，月餘亦卒，玦猶在手，拳不可開。」《通鑑》隨事附述此事，原意應在於褒美斛律氏之「貞」，而非兩人的愛情，然而，在其簡短的敘事中，仍可讓人感知高百年夫妻之篤於愛情，相較於其它潛隱在歷史敘事之中，必須細加察閱的隱微「愛情」，不僅較為明顯，而且感人，可謂《通鑑》書中唯一的「愛情故事」。

